

主编 郑涵 沈荟



传媒制度论丛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资助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 (1927~1937)

The film censorship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27-1937

赵伟清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传媒制度论丛

主编 郑 涵 沈 荟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传播学)建设项目资助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 (1927~1937)

The film censorship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27 - 1937

赵伟清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旨在讨论民国时期,尤其是1927~1937年上海公共租界的电影审查制度。1927年工部局确立了电影审查制度,在随后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电影审查制度日臻完善。工部局秉承自己的审查原则对租界内上映的中外影片实施全面控制,它的电影审查制度不仅异于宗属国英国、殖民地香港等地区,而且也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电影审查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本书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及媒体传播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考察,分析诸多引起电影审查制度变迁的因素,以及审查制度的变迁对民国电影业所造成的影响,以此来反观1927~1937年的民国政治与文化。

本书可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师生的研究参考书,也可为电影史爱好者的参考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1927~1937/赵伟清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传媒制度论丛)
ISBN 978-7-313-08509-2

I. ①上… II. ①赵… III. ①租界—电影—审查—上海市—1927~1937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986号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 (1927~1937)

赵伟清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春秋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8 字数:264千字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08509-2/J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3854186

序

郑 涵

赵伟清君《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1927~1937)》一书,在全球化语境中,以中国近代化为基本切入点,从中西错综复杂的跨文化内外交流、租界地与殖民地比较视角、民族国家建构诸多方面,利用大量档案资料以及其他史料,非常细致地陈述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历史演变、制度构架、基本内容,在一系列较为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探求其间所存在的主要原因,纠正了以往相关学术研究中的一些偏差。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不仅是近代上海文化领域十分重要的环节,而且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又综合地呈现了中国社会、政治、法律、行政、文化制度近代化的历程,折射了上海公共租界这一特殊的移民社区与英美传统跨空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租界地与殖民地在制度层面上显而易见的亲近性与耐人寻味的差异性,由此透露了近代中国全球化之马赛克与非线性彼此融合交汇的特点。这一制度形态在中国特定社会语境中发生、发展、式微的历史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错综复杂的矛盾性,以及处于近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族国家威权主义、武力冲突等汪洋大海之中,外来市民社会如履薄冰、岌岌可危的历史情境,进而反映出近代西洋帝国在东方命运的辩证法,就近代中国视角而言,则触及了现代性介入中国与中國嫁接现代性的艰巨性。

近代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既是现代性的结果,也是内在现代性潜力的自我诉求,这在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有所体

现。这一历史进程充满悲剧性。晚清的众人,是臣,是子民,是草民,在租界地是下等人。民国时代,国民政府管辖之下的人民,是国民,是成文宪法意义上的国民、自由人,在租界地还是下等人,只是持续有所改善。在市民社会萌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族战争等近代中国历史氛围中,威权主义政府力图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就近代电影审查制度而言,其结果是上海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日渐式微和国民政府电影审查制度的逐步强势,现代性一方面得以进取,另一方面又渐行渐远。也许,中国近代化只能在此悲剧性的辩证演进中,寻求历史可能性及其实现方式。

由此而论,该项学术研究蕴含丰富,问题意识突出,别开生面,颇具意义,也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无疑,赵伟清君之论著拓展了近代中国电影史的研究空间,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空白,不仅实质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电影史学研究,而且还为近代上海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

历史往往极为偶然。伟清君在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她的导师李坦克先生请余予以指导。其时,余引导学生研究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多年,反观近代中国,似乎有所心得。因此,提议伟清君研究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与此同时,特别提请注意德国学者贝克的全球化观念,在内外全球化、跨文化交流、近代殖民地与租借地之异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等视角内,探求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制度,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呈现近代中国现代性之演进。自此以后,伟清君数年如一日,不管酷暑严寒,无论刮风下雨,埋首史料,研读文献,孜孜以求,数易其稿,反复推敲,有所发现。

伟清君有所成就,余自然高兴。但是,余最看重的是她对于学问之道的一往情深。

对于学者而言,徜徉于问学途中,幸莫大焉。即便除此以外一无所有,也应满怀感恩之心。扪心自问,如此要求学生,太过严酷。放眼当今之世,有时不免茫然。但是,伟清君无怨无悔,一如既往,令人感动。

伟清君离沪赴法,天地更为宽广。衷心祝愿她永远幸福,永远那样纯粹而又满怀喜悦之情地投身于学术。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言 / 1

第二章 公共租界与电影审查 / 15

- 一、回溯公共租界历史 / 15
- 二、公共租界与工部局 / 20
- 三、公共租界概况 / 25
- 四、电影审查的萌芽 / 30

第三章 租界电影审查机构的组织沿革及职能变迁 / 51

- 一、英国本土电影审查概况 / 51
- 二、工部局电影审查权力合法性的确立 / 57
- 三、电影审查委员会 / 61
- 四、警务处 / 88
- 五、电影审查委员会与警务处的关系 / 93
- 六、电影审查的手续 / 98
- 七、电影审查问题调查委员会 / 99

第四章 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产生、施行与变迁 / 107

- 一、香港电影审查概况 / 108
- 二、公共租界电影审查具体条例的演变 / 111
- 三、对电影广告及招贴的审查 / 115

上海公共租界电影审查(1927~1937)

- 四、对字幕的审查 / 123
- 五、对违反电影审查法的判决 / 123
- 六、对儿童观看影片的规定 / 125
- 七、对舞台剧的审查 / 132

第五章 审查的主要内容 / 135

- 一、暴力犯罪片 / 136
- 二、色情片 / 138
- 三、危害社会道德的影片 / 141
- 四、战争民族片 / 144

第六章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构的关系 / 166

- 一、公共租界与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构的关系 / 167
- 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合作 / 199

第七章 公共租界电影审查的式微 / 205

- 一、纵横交织的国际环境 / 205
- 二、日本在租界施加的电影审查 / 209
- 三、取缔租界内电影检查机关 / 210
- 四、“《新地》事件”——废除租界电影审查运动的导火索 / 214

第八章 结语 / 225

参考文献 / 234

附录文献 / 251

后记 / 278

第一章 导言

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风云变幻、意识形态复杂的十年。1925年,“五卅运动”引发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伴随着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中国民众要求收回租界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还不太牢固,需要依靠英美国家的支持来完成国家的统一,因此在租界收回权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而公共租界经过70多年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以工部局为核心的市政管理体系,各项制度日趋完善,从而成为租界的范本。同时甲午战争后,日本在华的势力日益增长,也开始在租界里逐步扩大和巩固自身的权力。

在这十年间,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纵横交错,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国内经济与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上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同时由于上海人口众多而密集,多数属于移民,这其中包括众多的外国侨民,他们个人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消费能力相对也比较强,因此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此外,作为港口城市,上海与外界交流的经验颇为丰富,且以移民为主体的上海市民也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而租界里居住着众多外国侨民,他们的存在也非常有利于外国电影的进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为上海观众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日常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身为全国的工商业中心和主要消费城市,上海为电影业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

丰厚的基础。上海自 1896 年引入电影以来^①,在随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吸引了大量的优秀电影人才和资金,不仅成为中国的电影放映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电影制作中心。

与其他媒体尤其是纸质媒体相比,电影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以直观逼真的表现形式,通过视觉和听觉双重渠道,让观众如同身临其境,无不为内容而动情,且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因此电影对受众的影响远远超过报纸等其他印刷品媒体。随着电影的广泛上映,电影对社会生活影响日益重要,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但是,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也是一门产业,这个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商品,且具有很强的逐利性,基于此,影片为了吸引观众,往往倾向于表现暴力、恐怖、性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的传播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政府害怕电影不受限制完全自由后,传播的不道德或破坏性内容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电影诞生之后不久,人们就要求政府对其实行广泛而严格的管制。因此,在很多国家,电影若要公映,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电影的不良影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求对电影实施审查的舆论呼声也日益高涨。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对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规划管理,积极着手打造一个现代化中国。在文化方面,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为导向,实施文化政策,着力塑造新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电影有着其他传统媒体,例如报纸等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说,即使一部不成功的影片,其影响的观众也要远远多于书和杂志的读者^②。国民政府自然注意到这点,迫切希望将电影纳入自己的文化管理体系,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心,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实施管理的首要重地。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在这里有三个行政区域,分别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每个区域都被赋予了自治权。上海是国内

① 近年来,关于电影传入上海的时间有所争议。有学者认为上海徐园又一村所演“西洋影戏”是始于 1896 年 6 月 30 日,并非 8 月 11 日,而且当时放映的不是电影,而是幻灯。电影初到上海的时间为 1897 年 5 月间,首演地点在礼查饭店,继而在张氏味莼园的安垵地大洋房接演,接着又先后在天华茶园、奇园和同庆茶园演过。详细内容请参阅黄德泉. 电影初到上海考[J]. 电影艺术,2007(3).

② Leo C. Rosten. Movies and Propagand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54,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Nov., 1947): 116 - 124.

制片公司和国外影片商人集中的地方,且上海电影业的精华资源又多位于租界内。就电影放映市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各交战国受战争影响,影片产量减少,且无力兼顾远东市场,这为美国电影业提供了一个充分发展的机会^①。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片迅速崛起,各大电影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立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业务;一战结束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业已取代法国,占据了重要市场。上海是美国影片在华发行的重镇,米高梅、派拉蒙等八大公司均在沪设有办事机构,虽然这些办事机构有时候会更改地址,但是基本上都设在外滩附近的市中心区域,根据《上海市电影审查委员会业务报告》,可以得知:米高梅(Metro-goldwin-mager)设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55号,雷电华(Radio Pictures)、派拉蒙(Paramount)、福克斯(Fox Films)、哥伦比亚(Columbia Pictures)和联美(United Artists)等五家的办事处设在博物馆路(今虎丘路),环球(Universal)和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的办事处则设在四川路(今四川中路)^②。若以电影院数目为例,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电影院40家左右,而公共租界内的电影院数目基本上为27家左右^③(详细内容参照附录1和附录2),因此若要对上海的电影业实施有效管理,则必须拥有对租界地区电影业实施管理的权力。

虽然上海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但是整个上海的电影业是互为一体的,所以华界和租界的行政机构对电影实施的管理并不是单独进行的,必然

^① 杜云之. 中华民国电影史[M]. 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民国七十七年(1988):19.

^②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编.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业务报告[R]. 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至二十年(1931)六月:142-143.

^③ 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1年公共租界内的电影院数为27家,1932年为24家,1933年为28家,1934年为27家,1935年为25家,1936年为26家,1937年为17家。参一、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1,档号u1-1-957,上海市档案馆:58-59;二、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2,档号u1-1-958,上海市档案馆:145;三、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3,档号u1-1-959,上海市档案馆:16-17;四、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4,档号u1-1-960,上海市档案馆:162;五、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5,档号u1-1-961,上海市档案馆:206-207;六、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6,档号u1-1-962,上海市档案馆:215-216;七、电影检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文),1937,档号u1-1-963,上海市档案馆:240-243.

是相互影响的,租界当局对电影的管理,不仅引导了电影业的发展方向,也塑造了租界地区的文化娱乐氛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租界内,由于在文化传统、社会理念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很多的不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行政机构在电影方面的管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们各自的管理对电影业造成的影响也不同。综上所述,若要研究民国电影史,必然要涉及电影审查制度,而上海作为电影业发展的重镇,其行政机构对电影业的管理自然会成为研究的首要对象。

但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政治因素抑或是资料缺乏,租界电影审查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外对1927至1937年这段时期的电影发展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但大多数是从电影文化或艺术的角度入手。电影审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管理方面,尤其是萧知纬先生和汪朝光先生的一系列论文^①,颇可借鉴。萧知纬的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 Film Censorship and the Issues of Cantonese Dialect, Superstition, and Sex in the Nanjing Decade*(建构新的民族文化:南京十年中电影审查与广东方言、迷信和性的问题),该论文探讨了国民党是怎样在地区性(以粤语片为代表)、国际性(好莱坞影片中的性场面)、传统性(反映在古老中国的迷信方面)的相互参照中透过实施电影审查制度来建构新的民族文化,以及新的民族身份^②。萧知纬在其博士论文 *Film Censorship in China, 1927 - 1937*^③中把政党意识形态相对化,对电影审查本身进行实证研究。他认为,虽然国民党在实施电影审查制度的规则时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力图通过电影审查建构新式的“党治”国家认同,并通过

① 参一、汪朝光.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J]. 抗日战争研究, 2002(1); 二、检查、控制与导向—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研究[J]. 近代史研究, 2004(6); 三、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entral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1934 - 1937). *social sciences China*, Summer 2006; 四、“《不怕死》事件”之前后经纬及其意义[J]. 近代中国道城市与乡村, 2006.

② 参一、萧知纬. *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 Film Censorship and the Issues of Cantonese Dialect, Superstition, and Sex in the Nanjing Decade*: 183 - 199; 二、张英进. Introduction: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Republic Shanghai, 3 - 23; 均出自张英进(Yingjin-Zhang).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 - 194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萧知纬. *Film Censorship in China, 1927 - 1937*.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4.

对国语片和道德意象的提倡而使电影文化因之定型,所以在构建新的民族文化方面,电影审查制度起了很重要的、积极的和直接的作用。在其论文中,萧知纬主要利用二手材料简要介绍了租界的电影审查情况,他指出在电影审查规则上租界与英法两国本土实行的颇为相似,只是在上海,英法两租界更关注其民族自身的利益;他还分析了国民政府在建设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如何对租界地区放映的电影进行审查以及与租界当局所产生的矛盾冲突。

然当时租界当局并不认可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工作,对经过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构的电影进行复审,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其电影检查机构具有合法的审查权力,为什么得不到租界当局的认可?租界当局是否具有合法的审查权力?工部局为什么要对租界地区放映的电影实施管理,是否有明确的审查规则?工部局的电影审查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在制定的过程中,租界当局有没有参照英法两国本土的政策、或其他地区的审查规则?萧知纬的论文对这些方面的着墨虽不多,但他的论文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笔者能从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构的角度了解租界的电影审查工作。

汪朝光先生以较为详实的史料文献重现了从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当局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他的研究,主要依据国民政府的档案资料,完整地呈现了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状况,对上海的电影业研究颇多,但对租界的电影审查,他的研究同样涉及甚少。但在上海,尤其是在租界,国民政府、租界当局的审查同时存在,互相影响。因此,如果只研究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将会使我们对电影审查机构的权力和它的复杂性产生误解,在分析某些与电影审查相关的事件时存在着严重偏差。例如在分析“《不怕死》事件”的问题上,他主要描绘了上海市电影审查委员会积极主动地利用此次事件提供的契机,动用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力量,成功地将上海租界及外商影业纳入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体制。而汪对此次事件的另一方当事人——租界当局的电影审查机构的举措没有任何的描述,尽管整个事件可以说是租界当局和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机构互相博弈的结果。但租界当局是否真的同意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机构可以对租界放映的电影进行管理,以及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机构在对租界里的电影业实施审查的时候,是否得到租界当局的配合,或遭遇何种困难?

从电影放映之初,工部局对公共租界里放映的电影就承担了管理的职责。1927年,公共租界确立了电影审查的权力,它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电影审查法令,并成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审查机构,其电影审查与传统意义上其他国家的电影审查有着类似之处,道德是评判的标准,色情与暴力一直是其查禁的重点;同时公共租界作为万国公民的居留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不断地撞击、妥协与融合,使其所辖区域内的电影审查又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即民族感情与政治成为电影审查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此外公共租界也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因此对于租界当局来说,电影审查制度还有助于其推行政治、文化、外交政策,巩固完善其统治,在这片政治上保持所谓“中立”的区域里,各国各民族的权力机构和利益集团不仅干预电影审查,而且不断地争夺电影审查的管辖权,政治、民族感情等各种因素在电影审查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其后的十多年发展中,审查条例内容逐步成熟完善,租界电影审查制度也愈发健全,在1937年随着“《新地》事件”的发生,以及日本的进一步入侵,“废除租界电影审查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公共租界当局审查电影的权力遭到质疑,工部局面临严峻挑战,其所辖的电影审查工作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变更。从1927到1937年,公共租界的电影审查制度在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此为笔者选取这一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

鉴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电影审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方面,涉及租界电影审查方面的相关研究甚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笔者认为民国电影审查和租界电影审查是相互影响,交叉进行的,如果缺少租界电影史研究,民国电影史将很难深入下去,因此惟有将民国电影审查和租界电影审查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较为客观且较为完整地描述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历史形态。本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公共租界的电影审查制度,通过对六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较为系统而全面地勾勒出公共租界地区电影审查制度的历史形态,透视其内在结构,揭示其存在、演变和转型的原因。

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审查权的立法程序。

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其税收均来自租界居民,其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具体事务由工部局处理,工部局的董事由纳税人会议选

举产生。工部局并不是伦敦政府的下属机构,也不受各国中央政府驻沪领事机构的监督。工部局实质上是由公共租界商人寡头掌权。当然,公共租界商人主要来自英国,他们也需要仰仗英国军队的支持^①。总体上来说,公共租界在法律地位上只是一个居民居留地,只具有简单的市政管理权,并不具有司法裁判权,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各国的侨民。尽管如此,公共租界还是在有限的权力范围之内建立了以英国人占据主导地位的行政机构,在管理模式上基本是照搬西方行政体制,并在施政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行政机构,工部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工部局是否拥有对电影进行审查的权力,这个问题一直是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曾经困扰过租界当局。面对这个问题,工部局如何处理,并进而确立了自己对电影实施审查的权力?这是本书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租界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与变迁以及审查条例内容的来源与变化过程。

英国1909年《电影法案》以保护观众避免火灾危险为由,授权地方政府对电影放映场所进行检查的权力,其中模糊地包含着对公映电影进行审查的权限。1912年英国电影行业成立了自律组织——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hip,缩写为BBFC^②),其目的是为政府对电影放映场所实施检查、发放营业执照提供另外一种指导。英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继承了英国习惯法的传统,对电影具体隶属于什么级别并没有限制性的规定,只是根据社会的变迁选定不同的规则^③。

①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王菊,赵念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98-99.

②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ensorship)在1985年改名为英国电影分级委员会(The British Board of Film Classification),改名前后其缩写没有发生变化,均为BBFC.

③ 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从来没有正式的书面标准或规则来严格规定什么该删剪,什么可以宽容,什么样的内容该归入哪种分级级别。审片员主要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根据一部影片的总体格调来评判。第一任主席瑞德福特明确要求查禁的只有两条:“基督的活体形象不可接受,裸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通过。”但委员会也是根据一些指导原则来操作,例如奥康纳主席1916年定下的43条,内容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和粗话等方面。这使得一些影评家认为委员会没有书面规则的说法乃无稽之谈。确切地说,委员会执行的是“严格死板的非成文规则”,其非正式性为审查的灵活和开明留出了空间,使得委员会能够根据社会的变迁而适时调整尺度。因此英国的电影审查从来不具永恒性。当然,缺乏正式书面规则会导致评审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详细内容参见石同云.英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J].电影艺术,2004(2).

而公共租界对电影的管理,也是始于影剧院治安方面的考虑,主要依据电影院执照章程,该章程主要用于指导管理部门对电影院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此外,该章程还对允许放映的电影内容做了简单的规定,禁止“淫猥下流”和“有违社会道德标准”的影片在租界放映,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西方人在东方人面前的形象。1927年之后,公共租界出台了一系列日益成熟完善的电影审查条例。在这里我们将提出第二个疑问点: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和英国来说,最初的电影审查都是依据电影院执照章程实施管理,也可以说上海公共租界的电影审查与英国本土电影审查制度是相承接的。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为适应上海特殊的环境,其实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有没有背离英国本土习惯法^①式的审查制度,发生一些改变?档案资料显示,工部局在制定电影审查法则的时候,除了参考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的审查制度外,还考察了当时英属殖民地香港、印度^②、新

① 公元1066年,位于法国北部之诺曼人(Norman)从海上入侵英国本土征服英国;诺曼人文化水准较高,有大陆法系传统。但当其统治英国时,因英国本土先后曾受到丹麦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统治,已经存在各种不同风俗习惯及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非常分歧,标准也不相同。所以诺曼人在英国无法完全适用自己的法律规定,必须参酌英国当地各地方现有的法律制度。诺曼人统治英国后,英皇就指派自己任命的法官到各个领主区域的小法院审理诉讼案件,依据当地的习惯并参酌诺曼人自己的法律观念作判断,将判决的内容用文字记载成判决书,并以判决的内容作为日后新案件判断的标准,判决书非以条文方式显示,故称为不成文法;又因不成文法是由各地习惯累积成的,故称为“习惯法”。就电影院审查制度而言,英国的电影审查制度继承了英国习惯法的传统,虽有审查标准与分级指导,但没有很明确的法律条文,主要凭审查委员会的道德标准对电影进行审查与分级。习惯法的定义主要参考潘维大,刘文琦. 英美法导读[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

② 印度电影审查所关注的主要是宗教问题。也许一部电影对于孟买的观众来说没有任何恶意,但是在旁遮普(Punjab)却可能会引起流血杀戮,在整个印度,描写佛生活故事的电影是可以放映的,但是在缅甸则禁止此类电影的放映;印度的一些地方不允许电影中有接吻的镜头。而且在印度非官方的审查比官方的审查更有效果。在孟买有一个官方的电影审查组织,之所以选择在孟买设立审查机构是因为其是进口港口,是印度电影工业的生产和进口中心。如果电影和当地的感情相违背的话,地方当局也有权力停止电影放映。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工作效果十分良好,很少遭到人们的抱怨。电影审查委员会的主要审查人员拿薪资,其他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据时任《字林西报》编辑 Haward 个人所知,在印度,电影的海报还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淫秽下流”的影片在银幕上映演。参一、“Indian Cinema Report, June 1932”. Secretariat, S. M. C. Consuls-General Film Censorship(file 3)《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3)》,1932,档号 u1-3-2403(3),上海市档案馆;二、“Film Censorship Commission, Minutes of Eighth Meeting, Thursday, June 23, 1932, Exhibit ZZ, Indian Cinema Report, (from Mr. Haward)”. Secretariat, S. M. C. Film Censorship(file 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影片检查事(卷4)》,1932,档号 u1-3-2404(4),上海市档案馆。

加坡等地区电影审查规则,而且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又揉合进了中国本土的因素,逐步制定出一系列日益完善的审查规则。

第三个问题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电影审查方面的关系。

每个国家关于文化与社会的观点都不一样,而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同,所以各个国家很难在电影审查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或实现审查上的统一。虽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是居留地,但是却分别隶属于英国和法国名下,所以两租界在价值观以及市政运营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按理说,领事馆是租界的最高当局,领事是租界的最高行政长官。法租界就是如此,公董局由法国领事馆负责,领事无异于法租界的太上皇,他有权解散公董局董事会,另外任命一个董事会。但是,在公共租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商人势力的强大,领事实际上没有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由商业大王组成的工部局倒成了“高踞于租界之上”的政府,英商团体是工部局的实际操纵者。这些腰缠万贯的大富商,首先要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十分关注宗教事务和慈善事业。他们对自己用心创立的有限民主有着相同的尊重^①。而这“有限的民主”在对电影实施审查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既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两者在对各自行政区域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矛盾。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此多多少少都有所反映^②。但是鉴于某些共同的利益,两者又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所以两租界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微妙。那么,它们在电影审查方面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公共租界和国民政府在电影审查方面的关系。

1927年出现的国民党政权标志着上海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相当脆弱的。新政权控制的其实只有江浙地区,就

^①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101-103.

^② 譬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行政机构对卖淫业的管理措施不同,且警察部门之间缺乏合作,这给妓女管理增加了很多难度。参[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M].袁婴铭,夏俊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连国民党传统的根据地广东也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①,其他新被征服的省份依然为原来的统治者所控制,来自首都南京的命令无法在这些省份得到有效的执行,尤其是在财政方面。于是江浙地区成为新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而江浙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则成为这个新政权致力于在新生国家建立控制权的重要支柱和核心中枢。但是,上海市的两个中心区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不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权下的上海市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尽管国民政府非常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上海的最高统治当局。在此情况下,国民市政府不断寻找扩充自己权力的时机,争取各方面的控制权,但是为了在政治上获得英美国家的支持,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一些妥协与让步,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和国民市政府既存在权力上的争夺,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与合作。

至1930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国内的民族主义士气高涨,收回租界的呼声日高,“《不怕死》事件”的发生成为此时国民政府开展民族运动,建设新民族文化的助推剂,国民政府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这个事件,开始对租界地区放映的电影实施审查。这就引发了第四个问题:在公共租界这块国民党权力真空的区域,上海市国民政府的审查机关如何逐步取得对公共租界放映电影的审查权力,它为什么要这么做?租界当局对国民政府的审查有何反应?

第五个问题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电影审查机关如何对租界内的电影施加审查。

上海国民政府只是在名义上取得了对租界内放映的电影实施审查的权力,实际上租界内很多电影院对国民政府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命令阳奉阴违,而租界当局对国民政府的审查工作也没有给予太多的配合。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电影审查委员会真正实施电影审查的时候,却发现困难重重。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的电影审查机关如何对租界里放映的电影实施审查,其效果如何?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第五个问题。

^① 广东省的电影审查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独立于南京政府的电影审查机构而运转的。详细内容参见:萧知纬:Constructing a New National Culture: Film Censorship and the Issues of Cantonese Dialect, Superstition, and Sex in the Nanjing Decade[M]//张英进.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 - 1943: 183 - 199.